

农村人口老龄化、社会信任与农户宅基地退出

——基于安徽省金寨县614户农户样本

孙鹏飞 赵凯 贺婧¹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要】：基于宅基地退出试点区安徽省金寨县614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分组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农村人口老龄化、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信任的两种类型(即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均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产生显著积极影响;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均能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负向影响,缓解效应显著,且人际信任的缓解作用要强于制度信任。由此,提出完善宅基地退出户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提升农户社会信任水平、制定多元化宅基地退出政策等建议。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 社会信任 宅基地退出 人际信任 制度信任

【中图分类号】: F 3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56(2019)05-0137-09

伴随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与之相伴的是农村宅基地的低效利用与闲置荒废^[1]。这既影响耕地保护目标的实现,又不利于城乡统筹发展^[2-3]。为此,国家推行诸多政策鼓励农户退出宅基地。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统筹协调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稳妥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拓展改革试点,丰富试点内容。但从现实状况看,农户宅基地退出并不积极^[4]。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加重社会养老负担,家庭养老愈发困难,在农村该问题更为突出。据全国老龄办公布的数据,从2011年到2016年,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由15.55%增至19.15%。而现有宅基地退出政策未关注农户养老问题^[6],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的潜在影响不容忽视。同时,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文化建设始终受到政府重视,农户社会信任水平不断提升^[7]。社会信任是农户退出宅基地的心理基石。那么,社会信任会对农户宅基地退出产生怎样影响?社会信任水平提升导致农户间、农户与政府间沟通合作增多是否会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以及不同类型社会信任的缓解作用是否存在差异?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可以为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分析宅基地退出问题提供科学依据,在理论上丰富宅基地退出问题的研究内容,在实践中促进农户宅基地退出、提高农村宅基地利用效率。

纵观现有文献,学者们从农户基本特征^[8]、宅基地基本特征^[9]、隐形市场特征^[10]、制度保障与政策激励特征^[11-12]等方面研究农户

基金项目: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项目“农户宅基地有偿退出模式及优化研究”(RKX2019015A);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粮食主产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模式及运行机制研究”(15XJY010)。

作者简介:孙鹏飞(1990-),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宅基地退出。

通讯作者:赵凯(1971-),男,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土地经济及管理、区域经济等。

宅基地退出的影响因素。但上述研究忽略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加剧这一现实背景,未考虑社会信任在农户宅基地退出中的作用。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产生是农户基于收益最大化原则,与政府合作的结果^[13]。良好的社会信任,可以通过降低社会经济关系中的易变性及不确定性提高农户与他人的合作水平^[14],对农户宅基地退出产生影响。对此,本文以宅基地退出试点区安徽省金寨县农户为研究对象,运用Probit模型和分组回归模型,分析农村人口老龄化、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并探讨社会信任在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影响中的缓解作用。

本文拟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探索性研究:一是基于农村人口老龄化视角,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在分析中不仅考虑家中老人,同样考虑即将迈入老年阶段家庭成员带来的不利影响。二是探究社会信任与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之间的关系。社会信任不仅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有直接影响,同时在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影响中发挥缓解作用。三是基于社会信任的特征,将其划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分析不同类型社会信任对人口老龄化影响宅基地退出行为的缓解作用是否存在差异,深入探究人口老龄化、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产生的老年人口比例增长的动态演化现象^[15]。在我国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居家养老模式占主导地位。伴随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加速转变和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户其养老负担只增不减^[16]。而现有宅基地退出政策进一步加重农村老年人的养老负担:一是政府为降低安置成本,令农户“被上楼”“上高楼”,导致家中老人日常行动不便^[17],增加农户养老难度;二是现有宅基地退出政策改变农户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方式。农户日常所需蔬菜等食品的供给不再依赖庭院种植,电费、水费等生活支出增加^[18]。加之农村老龄人口因缺乏生产能力和生产技能,经济收入微薄,宅基地退出政策的实施额外增加农户的养老成本。可见,在现有宅基地退出政策下,农户家庭成员中老人数量越多,额外增加的养老负担越重,不利于农户退出宅基地。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1: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不利影响。

2. 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

社会信任为固定村域内农户长期交往形成的相互信任关系,有助于农户与他人构建稳定的合作规则和互惠机制,提高合作效率^[19]。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产生是其基于个人利益与政府合作的结果^[13]。合作依赖于准确的信息和可靠的执行^[20]。农户在做宅基地退出决策(即是否与政府合作)时,若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政府执行不可靠,会影响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产生。现有宅基地退出政策,虽宣传力度不断加大,但受宣传手段、方式单一限制,农户对宅基地退出政策相关信息的了解仍不足^[21],农户与政府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社会信任的存在,可以通过提高农户间信息交流共享的程度^[22],实现农户获取宅基地退出信息方式的多样性,增加农户对宅基地退出信息的了解,避免宅基地退出中信息不对称的发生,促使农户退出宅基地。且在宅基地退出政策实施中,农户往往不与政府直接对话,由村干部或乡镇干部代理执行。现关于宅基地退出政策的法律缺失,对政府执行缺乏监督^[23],增加了政府执行不可靠的可能性。而社会信任的存在,可以通过农户与村镇干部的有效沟通,发挥村镇干部的非正式保障作用^[24],降低政府执行不可靠的可能性,有利于农户退出宅基地。

同时,考虑到不同类型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借鉴国内主流研究,以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为纽带,把诸如首要群体、次要群体的亲疏远近定义为人际信任^[25],把依赖于法律、政策等制度环境,超越人际关系、具有约束力的信任定位为制度信任^[24,26]。前者主要表现为对家人、亲戚等的信任,后者主要表现为对村干部、乡镇干部等的信任。人际信任的存在,可以通过提高农户分享信息资源的意愿,使农户获得的信息更加准确、详实^[22],有利于打破信息不对称的局面,阻止合作中信息不对称的发生,有助于农户退出宅基地;制度信任的存在,则可以充分发挥村镇干部在宅基地退出中的非正式保障作用^[24]。且农户的制

度信任水平越高,农户对非正式保障发挥作用的信心越强,从而降低其对宅基地退出政府执行不可靠的担忧,进而选择退出宅基地。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2: 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具有正向影响。

H2a: 人际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具有正向影响。

H2b: 制度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具有正向影响。

3. 社会信任能否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的不利影响

如上文分析,农户养老难度的增加以及养老成本的上升,会额外加重农户的养老负担,对农户宅基地退出产生不利影响。宅基地退出政策规定,若农户退出宅基地,会给予农户一定补偿,包括现金补偿、实物补偿等;但忽略农户的社会养老保障^[27],会阻碍其退出宅基地。而社会信任的存在,有利于农户在生活中获得亲友支持,实现子女轮流养老或亲友帮扶养老^[28];通过分担养老压力,降低农户养老负担,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的不利影响。且宅基地退出政策实施处于初始阶段,政府虽承诺给予农户多项保障,但受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限制^[23],农户对政府承诺保障的信任度不高。而社会信任的存在,则能通过农户与村镇干部的有效沟通,提升农户对政府承诺的各种保障的信任(包括养老保障),最终减少农户对宅基地退出后养老问题的担忧,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不利影响。

不同类型社会信任对人口老龄化缓解作用的内在逻辑不同。一是人际信任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缓解作用。人际信任作为影响人际关系的调节因素,对农户间沟通有重要作用^[29]。高人际信任农户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在生活中更易获得亲友支持^[28]。且高人际信任农户对压力处理方式更为积极,抗压能力更强^[30],从而可降低农户的养老负担。二是制度信任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缓解作用。在宅基地退出中,农户往往与担任政府“代理人”角色的村干部、乡镇干部进行沟通。农户制度信任水平取决于农户对村干部、乡镇干部的信任^[24]。而农户制度信任,可以降低农户对宅基地退出中政府执行不可靠的担忧,提升农户对政府承诺的各种保障的信任,从而减少农户对宅基地退出后养老问题的担忧。

现实中,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程度和机理可能存在差异,从而引致其对人口老龄化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缓解作用有所不同。理由如下:一是制度信任作用的发挥会因村干部、乡镇干部工作能力不足而受到弱化,而人际信任作用的发挥所受约束条件要少得多;二是农户的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农户对家人、亲戚的信任要远胜于对村干部、乡镇干部的信任。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3: 社会信任能够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不利影响。

H4: 不同类型社会信任对人口老龄化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缓解作用存在差异。

二、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1. 模型设定

(1)Probit模型。本文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采用现实中农户是否已经退出宅基地来衡量,属于典型的二分类离散变量。对此,本文选用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构建Probit模型如下:

$$y_i = \alpha_i + \beta_{i1}PA + \beta_{i2}ST + \beta_{i3}PA \times ST + \gamma_{ij}X_{ij} + \epsilon_i \quad (1)$$

式(1)中, y_i 为农户的宅基地退出行为, 即是否已经退出宅基地; PA 为农户人口老龄化变量; ST 为农户社会信任变量; $PA \times ST$ 为农户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信任变量的乘积项, 以检验社会信任对人口老龄化影响的缓解作用; X_{ij} 为第 i 个农户的第 j 个控制变量; β 、 γ 为待估系数; ε_i 为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扰动项。

(2) 分组回归模型。若变量 X 对变量 Y 的影响, 与变量 M 取值有关, 则称变量 M 在 X 影响 Y 的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当 X 为连续型变量, M 为类别型变量时, 可采取分组回归方法, 检验变量 M 在 X 对 Y 影响中的调节作用^[31]。鉴于本文选用的人口老龄化变量可作为连续型变量, 调节变量社会信任可作为类别变量, 故采用该模型检验社会信任在人口老龄化影响农民宅基地退出行为中的调节作用。

2. 变量选择

(1) 因变量。本文因变量为农户的宅基地退出行为, 即农户是否已经退出宅基地, 答案包括“是=1; 否=0”两种情况。

(2) 核心自变量。本文核心自变量包括人口老龄化变量和农户社会信任变量。其中, 人口老龄化变量, 参考其他领域人口老龄化相关研究^[32-33], 用家庭人口老龄化率衡量家庭人口老龄化程度。家庭人口老龄化率是指60岁以上人口占家庭总人口比例(考虑到现今人均寿命延长, 60岁农户大部分仍具有生产、自理能力, 故在计算家庭人口老龄化率时不包括年龄为60岁的农户)。该指标不仅能够反映家庭老人数量占家庭总人数的比重, 还反映出家庭老人的总数及家庭所承担的养老负担, 与本文研究主题相符。农户社会信任变量, 借鉴相关文献^[24-25], 分别测度农户对家人、亲戚、村干部、乡镇干部四类人员的信任程度。依据其信任程度从低到高, 依次赋值1~5。其中, 1代表完全不信任, 2代表不太信任, 3代表一般, 4代表比较信任, 5代表完全信任。在此基础上, 运用SPSS 18.0 软件进行因子分析。得到公因子两个, 公因子1反映的是人际信任, 公因子2反映的是制度信任。最终, 根据各因子得分和方差贡献率, 可测算出农户社会信任状况的综合指标, 即社会信任=(53.872%×人际信任得分+24.860%×制度信任得分)/78.732%。

表1 社会信任变量说明及因子分析结果

类型	指标	含义及测度	均值	标准差	社会信任因子分析结果		方差贡献率/%
					因子 1	因子 2	
人际信任	对家人的信任程度	赋值 1~5	4.848	0.385	0.753	0.034	53.872
	对亲戚的信任程度	赋值 1~5	4.158	0.723	0.878	0.078	
制度信任	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	赋值 1~5	3.791	1.068	0.235	0.971	24.860
	对乡镇干部的信任程度	赋值 1~5	3.944	1.079	0.152	0.885	

(3) 控制变量。借鉴相关研究^[8-11], 本文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农户宅基地拥有状况三个方面。在户主特征方面, 本文假定户主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会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产生影响; 在家庭特征方面, 本文假定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家庭人口数会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产生影响; 在农户宅基地拥有状况方面, 本文假定宅基地面积、宅基地距乡镇距离会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产生影响(见表2)。

表2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宅基地退出行为			
	是否退出宅基地	是=1; 否=0	0.537	0.499
	人口老龄化			
	家庭人口老龄化率	60 岁以上人口占家庭总人口比例	0.313	0.528

核心自变量	社会信任			
	社会信任综合指标	对 4 个社会信任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后的综合得分	0.000	0.607
	人际信任	因子分析所得公因子 1	0.000	1.000
	制度信任	因子分析所得公因子 2	0.000	1.000
	户主特征			
	性别	男性=1; 女性=0	0.615	0.486
	年龄	户主实际年龄/岁	56.623	11.720
	受教育程度	户主受教育年限	5.000	4.134
	控制变量			
	家庭特征			
	家庭人均收入水平	实际调查的 2017 年家庭人均收入/万元	1.691	1.423
	家庭人口数	实际调查的家庭总人口数	4.299	1.815
	宅基地拥有状况			
	宅基地面积	实际调查的农户拥有的宅基地总面积/平方米	157.705	83.218
	宅基地距乡镇距离	实际调查的农户宅基地距所属乡镇的距离/千米	6.632	6.249

注: 由于在因子分析时采用了标准化处理, 社会信任、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变量的均值为0.000。

3.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8年7月到8月对安徽省金寨县农户开展的抽样调查。安徽省金寨县地处大别山腹地, 耕地资源稀少, 建设用地分布较为分散, 农户宅基地多建设在山区。伴随经济发展, 农村人口逐渐向山下基础设施完善区域转移, 山区宅基地大量闲置。自2015年12月起, 该县启动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 实行《金寨县农村宅基地自愿退出奖励扶持办法(试行)》, 引导农户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对属于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范围的, 给予地上房屋拆除补偿(框架结构600元/平方米、砖混结构430元/平方米、砖木结构350元/平方米、土木结构250元/平方米)和宅基地退出补偿(已确权发证及未确权发证但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现场核实且符合规定面积标准的, 按70元/平方米给予补偿;超出规定面积的, 按35元/平方米给予补偿)。截至2017年底, 金寨县自愿申请有偿退出宅基地2.09万户、7.37万人, 复垦农村宅基地3万多亩, 取得显著成效。因此, 本文选取金寨县作为研究区域, 分析该地区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考虑到距金寨县城距离不同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可能存在差异, 课题组随机选取金寨县城周边的梅山镇、全军镇和白塔畈镇, 距县城较近的槐树湾镇、双河镇、油坊店镇和桃岭镇, 以及距县城较远的青山镇、古碑镇和燕子河镇, 并采用分层逐级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选取样本农户。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650份, 得到有效问卷614份, 问卷有效率为94.46%。农户问卷调查主要针对户主进行调查, 内容包括家庭人口结构及劳动力就业状况、宅基地退出基本状况、社会信任情况、对宅基地政策和宅基地退出政策的认知、评价状况等方面。

4. 样本描述

从样本农户基本特征看, 男性占61.6%;年龄在46~55岁的占30.8%;户主受教育程度集中在小学及以下, 其中小学文化程度占比达42.9%;家庭人数在4~6人的占受访家庭的61.4%;仅有1块宅基地的农户占99.0%;宅基地面积在101至200平方米的占受访家庭的53.4%;实际耕地面积在3亩以下的占60.4%;家庭人均收入在1~2万元的占受访家庭的43.8%(见表3)。总体上看, 样本农户与安徽金寨的实际情况相符, 被调查农户及其所在家庭具有代表性。

表3 样本农户的基本情况

类型	选项	人数	占比/%	类型	选项	人数	占比/%
性别	男	378	61.6	宅基地块数	1	608	99.0
	女	236	38.4		2	6	1.0
年龄	45岁及以下	98	15.9	宅基地面积	100平方米及以下	173	28.2
	46~55岁	189	30.8		101~200平方米	328	53.4
	56~65岁	151	24.6		201平方米及以上	113	18.4
	66岁及以上	176	28.7	实际耕地面积	3亩以下	371	60.4
受教育程度	文盲	159	25.9		3~10亩	209	34.1
	小学	264	42.9		10亩以上	34	5.5
	初中	125	20.5	家庭人均收入	1万元以下	172	28.0
	高中及中专	40	6.5		1~2万元	269	43.8
	大专及以上	26	4.2		2万元以上	173	28.2
家庭人数	3人及以下	199	32.4				
	4~6人	377	61.4				
	7人及以上	38	6.2				

三、估计结果与分析

在进行模型估计前,采取方差膨胀因子法对所有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VIF 值均小于10,不存在共线性问题。进而运用 Stata 14.0软件,首先,考察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方程1);其次,引入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变量,分析不同类型社会信任的影响(方程2);然后,引入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信任的交互项,考察社会信任能否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方程3);最后,引入人口老龄化与人际信任、制度信任的交互项,考察不同类型社会信任对人口老龄化影响宅基地退出行为的缓解作用是否存在差异(方程4)。模型估计结果见表4。

1. 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

表4中方程1和2的估计结果均显示,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有负向影响,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即60岁以上人口占家庭总人口比例越高(家中老人数量越多),农户越倾向于选择不退出宅基地。样本统计结果显示,家中老人数量为0人、1人、2人的农户中,选择退出宅基地的农户所占比例分别为67.20%、51.83%和43.90%。随家中老人数量增多,选择退出宅基地的农户所占比例不断下降。假说1得到证实,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确实有不利影响。

表4 农村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影响的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方程 1		方程 2		方程 3		方程 4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人口老龄化	-0.222**	0.067	-0.251**	0.071	-0.739*	0.263	-0.724**	0.235
社会信任综合指标	0.624***	0.095			0.502***	0.112		
人际信任			0.558***	0.065			0.418***	0.087
制度信任			0.173**	0.005			0.132*	0.071
人口老龄化 X 社会信任					0.119**	0.059		
人口老龄化 X 人际信任							0.139*	0.071

人口老龄化 X 制度信任							0.086**	0.039
户主特征								
性别	-0.215*	0.109	-0.195	0.124	-0.224*	0.119	-0.212*	0.126
年龄	-0.011**	0.005	-0.012**	0.006	-0.011**	0.005	-0.012**	0.005
受教育程度	-0.014	0.015	-0.005	0.016	-0.013	0.015	-0.006	0.016
家庭特征								
家庭人均收入水平	-0.021	0.038	0.006	0.039	-0.012	0.038	0.016	0.040
家庭人口数	-0.071**	0.031	-0.078**	0.032	-0.068**	0.031	-0.069**	0.033
宅基地拥有状况								
宅基地面积	-0.005***	0.001	-0.005***	0.001	-0.005***	0.001	-0.005***	0.001
宅基地距乡镇距离	-0.003	0.009	-0.009	0.009	-0.004	0.009	-0.010	0.009
PseudoR ²	0.144		0.219		0.145		0.232	
卡方检验统计量	122.440***		185.280***		126.980***		196.950***	
对数似然值	-362.650		-331.227		-360.378		-325.393	

注：*、**、*** 分别表示在10%、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2. 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

表4中方程1估计结果显示, 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社会信任能促使农户选择退出宅基地。假说2得到验证, 即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积极影响。此外, 表4中方程2估计结果显示, 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均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该结果与假说2一致, 不论是人际信任还是制度信任, 都会促使农户选择退出宅基地。同时, 这一结果也验证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3. 社会信任对人口老龄化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缓解作用

表4估计结果显示, 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信任的交互项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表明社会信任能够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不利影响, 假说3得到验证。随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 社会养老负担加重, 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户其养老负担只增不减^[5], 且宅基地退出增加农户的养老难度和养老成本, 额外加重农户的养老负担, 阻碍农户选择退出宅基地。而社会信任的存在, 则能通过发挥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的作用, 降低农户养老负担、减少农户对宅基地退出后养老问题的担忧, 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不利影响。

此外, 本文深入探究的另一个问题是, 不同类型社会信任对人口老龄化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缓解作用是否存在差异。表4中方程4估计结果显示, 人际信任、制度信任与人口老龄化交互项均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表明人际信任、社会信任均能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不利影响。但从影响强度看, 人际信任的缓解作用要强于制度信任, 假说4得到验证。两种社会信任缓解作用存在差异的原因在于: 其一, 村干部、乡镇干部在宅基地退出中担当带头人和组织者, 具有较强号召力和组织力, 能动员农户退出宅基地。对农户来说, 村干部和乡镇干部的潜在作用相当于提供一种非正式制度保障。然而, 这种制度信任作用的发挥会因村干部、乡镇干部工作能力不足被弱化^[22]。对样本统计结果也显示, 40.3%的农户认为村干部、乡镇干部在宅基地退出中存在工作能力不足问题, 导致宅基地退出政策执行不规范, 从而减弱了制度信任的缓解作用。其二, 农户的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水平存在差异, 农户制度信任水平不高, 制度信任的缓解作用也相对较弱。由表1可知, 农户制度信任均值为3.868, 而人际信任均值为4.503, 制度信任水平相对较低, 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

4. 控制变量的影响

户主特征中,性别对宅基地退出行为有负向影响。受宅基地退出补偿标准低影响,农户退出宅基地重新安置后负债现象普遍,而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男性,与女性相比,男性面临更大的还债压力,导致男性不愿退出宅基地。年龄对宅基地退出行为有负向影响,年龄大的农户思想较为保守,更看中宅基地的居住养老功能,不愿退出宅基地。家庭特征中,家庭人口数对宅基地退出行为有负向影响。家庭人口数越多,宅基地退出后面临的住房压力越大,不利于农户宅基地退出。宅基地拥有状况中,宅基地面积对宅基地退出行为有负向影响。宅基地面积是农户原有生活状态的反映,宅基地面积越大,表明农户原有生活越舒适,因满足于现状而不愿退出宅基地。

5. 稳健性检验与进一步讨论

考虑到选取的模型会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本文进而选用分组回归模型,采取Logit回归方法,探究农村人口老龄化、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以进行稳健性检验(表5)。具体为:根据农户人际信任得分,将农户分为低人际信任和高人际信任两组,对比不同组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影响的差异。表5显示,人口老龄化对两组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且边际效应为负。但从影响强度看,人口老龄化对低人际信任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不利影响要强于高人际信任,即人际信任确实能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不利影响。

根据农户制度信任得分,将农户分为低制度信任和高制度信任两组,对比不同组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影响的差异。表5显示,人口老龄化对两组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且边际效应为负。但人口老龄化对低制度信任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不利影响要强于高制度信任,即制度信任确实能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不利影响。同时,据表5可知人口老龄化对低人际信任和高人际信任两组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影响的边际效应绝对值差值较大,为0.273,而在低制度信任和高制度信任两组,差值仅有0.028。这表明两种社会信任缓解作用存在差异,人际信任的缓解作用要强于制度信任。该结论证实前述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5 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影响的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低人际信任农户		高人际信任农户		低制度信任农户		高制度信任农户	
	边际效应	标准误	边际效应	标准误	边际效应	标准误	边际效应	标准误
人口老龄化	-0.525**	0.162	-0.253**	0.075	-0.347***	0.134	-0.319***	0.085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PseudoR ²	0.271		0.085		0.203		0.132	
卡方检验	48.830***		56.660***		51.290***		67.670***	
对数似然值	-65.692		-304.966		-100.897		-223.548	

注:为对比不同组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影响的差异,Logit模型估计结果报告的是边际效应,标准误由德尔塔方法(delta method)计算得出。限于篇幅,未报告其他变量的估计结果。由于在因子分析时采用了标准化处理,农户人际信任得分和制度信任得分均值为0.000。所以,本文将农户人际信任得分大于等于0.000的定义为高人际信任农户,人际信任得分小于0.000的定义为低人际信任农户;将农户制度信任得分大于等于0.000的定义为高制度信任农户,制度信任得分小于0.000的定义为低制度信任农户。

伴随宅基地退出政策大力推进,农户宅基地退出决策愈发理性化^[34]。中国老龄化社会已经到来,作为理性经济人,农户在宅基地退出中不仅担忧家中老人的养老问题,还有即将迈入年老阶段家庭成员的养老问题。尤其是处于51~60岁年龄段的家庭成员,

考虑到宅基地退出是长期性过程,该年龄段成员在宅基地退出后面临的养老问题更加紧迫。对此,本文引入“41~50岁比例”“51~60岁比例”变量分别进行回归(见表6中方程1、2)。结果显示:仅“51~60岁比例”在5%的显著水平上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有负向影响。51~60岁人口所占比例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产生不利影响,家庭中该年龄段成员养老负担进一步增加,阻碍农户退出宅基地;而“41~50岁比例”考虑家庭成员的养老问题尚且过早,因此该年龄段结果不显著。

此外,将“41~50岁比例”“51~60岁比例”“60岁以上比例”三个变量同时进行回归(见方程3),结果与上文一致,再次证实上述分析的准确性。由此得出:在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影响时,不仅要考虑家中老人,同样要考虑即将迈入年老阶段家庭成员带来的不利影响。而现有研究在分析人口老龄化问题时,仅关注家中60岁以上人口比例,而忽略了51~60岁人口比例在农户行为决策中的作用,低估了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如何突出家庭51~60岁人口比例在农户宅基地退出中的具体作用,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表6 家庭人口结构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影响的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方程 1		方程 2		方程 3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家庭人口结构						
41~50 岁比例	0.304	0.234			0.095	0.247
51~60 岁比例			-0.443**	0.225	-0.393*	0.237
60 岁以上比例					-0.611**	0.271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PseudoR ²		0.080		0.082		0.086
卡方检验统计量	68.810***		71.000***		74.480***	
对数似然值	-397.956		-396.860		-394.496	

注:限于篇幅,未报告其他变量的估计结果。考虑到家庭人口结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共线性,在分析前,本文对“41~50岁比例”“51~60岁比例”“60岁以上比例”及其他控制变量进行了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VIF 值均小于10,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四、结论与启示

引导农户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实现农村宅基地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不仅有利于耕地保护目标的实现,同样有利于城乡统筹发展。而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给农户宅基地退出带来新的挑战,同时社会信任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因此,本文利用宅基地退出试点区安徽省金寨县614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分组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农村人口老龄化、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人口老龄化、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家中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越高,农户越倾向于不退出宅基地;社会信任的提升则能促使农户选择退出宅基地。第二,从不同类型社会信任影响来看,不论是人际信任还是制度信任,均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三,社会信任能够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不利影响,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的缓解效应均显著,且人际信任的缓解作用要强于制度信任。第四,控制变量中,性别、年龄、家庭人口数和宅基地面积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促使农户理性退出宅基地,可采取以下对策:第一,完善宅基地退出户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立与老龄社会发展需求相符的养老、医疗等保障制度,健全老龄人口生活料理、精神慰藉等老龄服务体系,减少宅基地退出农户的养老负担。第二,提升农户社会信任水平。积极组织农村文化活动和生产互助活动,通过合作交流,提高农户间的信任程度;通过在活动中

展示村干部、乡镇干部的工作能力和亲民作风,提高农户对村干部、乡镇干部的信任。第三,制定多元化宅基地退出政策。根据不同农户的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信任差异,制定适用于不同农户群体的差异性宅基地退出政策,避免“一刀切”做法影响宅基地退出工作的顺利推进。

参考文献:

- [1] 邹伟,王子坤,徐博,等.农户分化对农村宅基地退出行为影响研究——基于江苏省1456个农户的调查[J].中国土地科学,2017,31(5):31-37.
- [2] 钱龙,钱文荣,陈方丽.农户分化、产权预期与宅基地流转——温州试验区的调查与实证[J].中国土地科学,2015,29(9):19-26.
- [3] 万亚胜,程久苗,吴九兴,等.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与退出行为差异研究[J].资源科学,2017,39(7):1281-1290.
- [4] 吴郁玲,石汇,王梅,等.农村异质性资源禀赋、宅基地使用权确权与农户宅基地流转:理论与来自湖北省的经验[J].中国农村经济,2018(5):52-67.
- [5] 李乐乐.我国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94-102.
- [6] 刘庆乐.农户宅基地使用权退出价格形成机制探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27(2):170-176.
- [7] 王宁.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文化建设的现状及发展进路——基于浙江农村文化礼堂的实践探索[J].湖北社会科学,2018(9):46-52.
- [8] 韩冬,韩立达,张懿,等.市场化视角下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研究[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8,39(1):19-27.
- [9] 朱新华,陆思璇.风险认知、抗险能力与农户宅基地退出[J].资源科学,2018,40(4):698-706.
- [10] 杨玉珍.农户闲置宅基地退出的影响因素及政策衔接——行为经济学视角[J].经济地理,2015,35(7):140-147.
- [11] 胡方芳,蒲春玲,陈前利,等.欠发达地区农民宅基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24(4):116-126.
- [12] 周婧,杨庆媛,张蔚,等.贫困山区不同类型农户对宅基地流转的认知与响应——基于重庆市云阳县568户农户调查[J].中国土地科学,2010,24(9):11-17.
- [13] 付文凤,郭杰,欧名豪,等.基于机会成本的农村宅基地退出补偿标准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28(3):60-66.
- [14] 蔡起华,朱玉春.社会信任、收入水平与农村公共产品农户参与供给[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1):1-50.

-
- [15] 冯剑锋, 陈卫民. 我国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基于中介效应视角的探讨[J]. 人口学刊, 2017, 39(4):93-101.
- [16] 汪伟, 刘玉飞. 人口老龄化与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升级——基于CFPS 2012数据的实证研究[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5):84-92.
- [17] 佟艳, 牛海鹏, 樊良新, 等. 农户闲置宅基地退出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河南省为例[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7, 31(10):26-30.
- [18] 关江华, 黄朝禧, 胡银根. 不同生计资产配置的农户宅基地流转家庭福利变化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4, 24(10):135-142.
- [19] 史恒通, 睢党臣, 吴海霞, 等. 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流域生态治理行为的影响:以黑河流域为例[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1):34-45.
- [20] 张继亮. 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社会资本逻辑理路探析[J]. 学术交流, 2014(6):45-49.
- [21] 王兆林, 杨庆媛, 骆东奇. 农民宅基地退出差异性受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土地科学, 2018, 32(9):28-34.
- [22] 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3):481-510.
- [23] 朱从谋, 苑韶峰, 李胜男, 等. 基于发展权与功能损失的农村宅基地流转增值收益分配研究——以义乌市“集地券”为例[J]. 中国土地科学, 2017, 31(7):37-44.
- [24] 史雨星, 姚杨柳, 赵敏娟. 社会资本对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意愿的影响——基于Triple-Hurdle模型的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 2018(3):35-50.
- [25] 何可, 张俊飏, 张露, 等. 人际信任、制度信任与农民环境治理参与意愿——以农业废弃物资源化为例[J]. 管理世界, 2015(5):75-88.
- [26] 邹宇春, 敖丹. 自雇者与受雇者的社会资本差异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11(5):198-224.
- [27] 姚树荣, 熊雪锋. 以宅基地有偿退出改革助推易地扶贫——四川省泸县“嘉明模式”分析[J]. 农村经济, 2017(2):21-24.
- [28] 魏真瑜, 赵治瀛, 郑涌. 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对其从众倾向性的影响[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7, 39(10):139-146.
- [29] GIFFIN K. The contribution of studies of source credibility to a theory of interpersonal trust in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67, 68(2):224-234.
- [30] GRACE G D, SCHILL T. Social support and coping style differences in subjects high and low in interpersonal

trust[J]. Psychological eports, 1986, 59(2):584-586.

[31] 苏岚岚, 何学松, 孔荣. 金融知识对农民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基于农地确权颁证调节效应的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8):17-31.

[32] 杨志海. 老龄化、社会网络与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来自长江流域六省农户数据的验证[J]. 中国农村观察, 2018(4):44-58.

[33] 白军飞, 闵师, 仇焕广, 等.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肉类消费的影响[J]. 中国软科学, 2014(11):17-26.

[34] 郭晓鸣, 虞洪. 建立农村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的现实分析与政策构想——基于四川省的实证研究[J]. 农村经济, 2016(5):3-9.